

■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 ■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编 主编 齐岸青

西台集

〔宋〕毕仲游撰 陈斌校点

贵耳集

〔宋〕张端义撰 梁玉玮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台集/(宋)毕仲游撰;陈斌校点. 贵耳集/(宋)张端义撰;梁玉玮校点.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4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

ISBN 7-5348-2492-3

I. ①西…②贵… II. ①毕…②陈…③张…

④梁… III. ①古典文学—中国—北宋—作品集②笔记—中国—南宋—作品集③史料—中国—南宋

IV. I214. 412②I264. 4③K244.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774 号

责任编辑:张弦生

责任校对:李 远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豫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4

字数:352 千字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492-3/I·825 定价: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任：李 克

主 任：王文超

副 主 任：赵建才 李柳身 杨丽萍 尚有勇 孙新雷
王 薇

编 委（按姓氏笔画）：王志坚 司福亭 任 伟
齐岸青 刘河明 张保科 张晓圻 宋柏松
范 强 岳俊华 庞新智 赵 健 郭书营
主 编：齐岸青

卷首语

古都历史是国家文明发展的核心载体，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古都郑州地处华夏文明发祥之地，人文荟萃，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足以影响我们民族文化形成、国家发展的故事最初就是在这块土地演绎诉说的，根脉传袭为后世留下永恒而瑰丽的遗产。

寻求郑州古都历史文化的脉络，我们可以触摸到约十万年前织机洞古人类活动遗迹，七千多年前裴李岗农耕原始文明遗址和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尤其是郑州地区考古发现的西山古城、王城岗古城、新寨古城、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郑韩故城……更是讲述自黄帝、夏禹、商汤以来古都郑州的辉煌，丰厚的文化遗存无言地镌刻着郑州古都历史之碑。尤其是郑州商城遗址，历经五十餘年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论证，其商王朝开国之亳都的历史地位已是无可辩驳的史实。郑州商城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内涵之丰富，气魄之宏伟，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它不仅是至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商城遗址 3600 年以来始终在见证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在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是我们城市的光荣，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在它飞跃发展保持充沛生命活力的同时，也传承珍藏了无数文化遗迹，这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蕴含的文化精髓，无疑是这座文明古都的生命根系和精神魂魄。对古都文化的发掘、保护、整理、研究、发展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其

间市民的责任,更是我们城市建设者、决策者神圣的义务。我们只有认识历史,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才有可能建设未来的新郑州。鉴于此,《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是一件文化绵延、福祉后世的工作,希望丛书能够成为我们文化血脉相承的重要构成。

王世林

西 台 集

〔宋〕毕仲游 撰

陈 斌 校点

前 言

宋代郑州籍文士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当推毕仲游的《西台集》。

毕仲游（1047—1121），字公叔，郑州管城人。出身名门，其曾祖父毕士安乃真宗朝重臣，曾力荐寇准，二人同拜宰相，并协力促成宋、辽签定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而名重一时。毕仲游幼年即聪颖好学，博及群书，尤工于诗文。与兄仲衍同科登第，历任柘城主簿、罗山县令等职。元祐初，召试学士院，问策者九人，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辈。毕仲游因文章优异，得到苏轼赏识，而擢为第一名，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提河东路刑狱。

徽宗时，毕仲游历知郑、郛二州、京东、淮南转运使，后入为吏部郎中。其居官机敏干练，而又清廉独慎，人称其“绰有能声”。《宋史》记载：毕仲游在太原时，当地盛产铜器，他从不购置一物，又担心人们议论自己矫情，奉调移官时，仅买了二个铜茶匕而去。韩缜曾笑谈：“如公叔可谓真清矣。”其知耀州时，适逢天灾频仍，毕仲游忧虑百姓口粮不济，先虚张声势，晓喻全境，说官府已备下赈施与余粮若干万斗。富人知其有备，不敢囤积居奇，纷纷平价余粮，大灾之年，其辖境十八万百姓粮食无缺，无人逃难他乡。毕仲游由此受到上司褒奖。

毕仲游早年曾受知于司马光、吕公著，但不及重用。范纯仁最了解他的才能，当政时又逢毕仲游居母丧，仕途未能大进。其

后“亦堕党籍，坎壈散秩而终，年七十五”（《宋史》）。

《西台集》的西台，喻意为西京御史。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以其在西京，亦号西台。”毕仲游终官于西京留司御史台，其文集故以“西台”为名。最早著录此书的是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为《毕公叔西台集》二十卷，陈叔易为之序。比晁晚几十年的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著录为《毕仲游西台集》，未著卷数。元初所撰的《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为《毕仲游文集》五十卷。原书早已佚失。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排比，计有奏状二首、札子二首、表六十二首、议十八首、试策一首、策问三首、论二首、序一首、记五首、传二首、书二首、启六十八首、状十七首、尺牋一百四十八首、祝文二十一首、志铭十九首、行状四首、祭文二十首、诗词二百六十八首，厘为二十卷，诸体诗文齐全，以《西台集》之名，收进《四库全书》别集类中。可惜的是陈叔易的原序无从辑考。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著录《西台集》为二十卷是准确的，《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五十卷，应是“五”与“二”字之误。

《西台集》是一部极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毕仲游的文字才华在集中得到尽致展示。其行文议论有据，切情合理，笔锋舒畅，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宋史》称：“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苏轼的评价略有保留，亦称毕仲游“学贯经史，才通世论，文章精丽，论议有馀”。《四库全书》提要则赞许说：“今观其著作，大都雄伟博辩，有馀万万斛之致，于轼文轨辙最近。”其评价几于苏轼等肩。

《西台集》又是宋代的一部重要史实资料。毕仲游经历的时代，正是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变法，改革派与守旧派，以及守

旧派内部洛党（程颐为首）、蜀党（苏轼为首）、朔党（刘摯为首）之争异常尖锐的时期。毕仲游作为守旧派中的温和人物，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这场政治旋涡之中，《西台集》正如实反映出了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和那段史实。如苏轼当时在朝中颇以文章规切时政，无所顾忌，毕仲游担心他因此致祸，在集中《上苏学士书》戒之曰：“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今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臆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这时毕仲游表示更多的是忧虑、调和。又如司马光当政后，大反王安石所为，而所用之人多为王安石旧人，反对新法自然不够彻底。毕仲游在《上司马温公书》中说：“阁下今欲去新法之敝，救荆公之事，而左右……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以此去新法，救荆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间，以其病之犹在也。”这时毕仲游俨然又成了反对新法的坚定斗士。他的心态是矛盾的，但他的担忧却不是多余的，此后苏轼、司马光果如其所虑，先后获罪。《四库全书》提要评价毕仲游“是其深识远计，尤不可及，固非独文辞之工矣”，实为公允之言。客观地说，毕仲游站在自身立场，对新法多有微词，其语也多有偏颇，此段公案，后人自有评说。不管怎样，《西台集》得以存世，为今人研究宋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西台集》现存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校点者在整理时，采用《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参阅《丛书集成初编》本为互订。从版本来看，《四库全书》本《西台集》辑录于《永乐大典》而编，应为最完整的版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虽引用了《四库全书》提要，但在编者按语说明其主要采用的是《武英殿聚珍本》，因此二者又略有差异。校点者现根据《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的统一体例，仅对原书个别错讹字进行更正，两种版本有相异处，则作校记以注明；

集中涉及到与作者交游的重要历史人物，凡史书中有据可考者，也作校记说明。其余概从原貌，以供读者自行阅读鉴别。

《西台集》作为古代郑州籍作者的一部重要著作，得以在郑州商都建都 3600 年之际正式出版，甚感欣慰。对于校点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尚请读者谅解。同时也向给予我指导的张万钧、周树德、张惠民先生致以谢意。

陈 斌

2004. 12

目 录

卷一	(1)
奏状二首	(1)
札子二首	(10)
卷二	(12)
表三十一首	(12)
卷三	(28)
表三十一首	(28)
卷四	(45)
议九首	(45)
卷五	(59)
议九首	(59)
卷六	(69)
试策一首	(69)
策问三首	(73)
论二首	(75)
序一首	(78)
记五首	(79)
传二首	(85)
卷七	(91)
书三首	(91)

卷八·····	(105)
书五首·····	(105)
启十七首·····	(114)
卷九·····	(122)
启五十一首·····	(122)
状十七首·····	(145)
卷十·····	(150)
尺牍七十九首·····	(150)
卷十一·····	(178)
尺牍六十八首·····	(178)
卷十二·····	(203)
祝文二十一首·····	(203)
志铭三首·····	(210)
卷十三·····	(216)
志铭七首·····	(216)
卷十四·····	(233)
志铭九首·····	(233)
卷十五·····	(245)
行状一首·····	(245)
卷十六·····	(255)
行状三首·····	(255)
卷十七·····	(273)
祭文二十首·····	(273)
卷十八·····	(286)
五言古诗三十二首·····	(286)
七言古诗十六首·····	(296)

卷十九	(303)
五言律诗一百十首	(303)
五言长律四首	(322)
卷二十	(325)
七言律诗五十四首	(325)
五言绝句四首	(338)
七言绝句四十八首	(339)
附录	(349)
《四库全书》提要.....	(349)

西台集卷一

奏 状

理会科场奏状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内，充进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来，累蒙差入试院，对读考校，熟见举人科场文字，颇知诗赋、经义取士利害之实。自朝廷议改科举，欲具奏陈，而臣备员府僚，事务繁并，猝无须臾之暇，得尽愚见。今臣获解府事，待罪儒馆，窃闻士大夫所论科举之利害，犹未有定说。尚诗赋者则指经义为易习难考，而不言诗赋之名卑于经义；尊经义者则指诗赋为雕刻无用，而不思经义于取士其实如何。诗赋、经义之利害，固已未决，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此所以更相不信而无定说也。夫诗赋非经义之比易见也。使举子为声病偶俪之文章，以应有司之求，与以圣人之经原圣人之意而立其说，则道之尊卑，志之远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诗赋之行，几五六百岁而未厌，自隋唐以来，高才达识，立功名有道艺者，往往出于其间。经义之行，无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复诗赋，岂尊且远者不足以济务，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盖亦要其本末始终而论之。盖经术者古学也，可以谋道而不可以为科举之用；诗赋者今学也，可以为科举之用而不足以谋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为科举而治

经，且如辅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礼》，安国之治《书》，杜预之治《春秋》，则虽举隋唐以来诗赋，岂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纳四人于今日科举之间，则亦化为举子之文章矣。诗赋、经义之利害，至此而见，臣请明言之。

扬子曰：“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度，则其载物也薄矣。”盖言圣人之经，幽深闲远，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汉唐诸儒，亦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而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学，不足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经义为科举者，欲尊经术耶？欲卑经术耶？欲卑经术，固无此理，然使举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为卜利禄之具，则是欲尊经术而反卑之。诗赋之学，固无益于圣人之经，而圣人之经术，不为举子之所乱，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举之外，正心、诚意、治经、谋道。若曰治经为佛老之学，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为，何损于经？则既以经术为卜利禄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虑，交于目前，臣恐后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为术不善则一矣，岂可逆知其无损？此诗赋、经义之利害，可得论者一也。

夫举子之取名第，止问得失而已，既问得失，则不得不趋时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则经义欲合司马光。其小焉者不可胜论，臣请论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宁、元丰之间，经义遂废《春秋》一科，而学者亦讳